

数字时代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探究

邓悠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DOI:10.61369/RER.2026010022

摘 要 : 数字时代居民消费结构的深刻变迁, 通过供需匹配优化、内需规模扩展与资本形成效率重塑等传导路径, 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系统性影响。消费数字化升级驱动产业柔性响应, 新业态提升边际消费倾向, 但消费分层与跨期配置亦引致区域非均衡、产能错配及收入分配黏性等增长约束。优化路径在于以数字基建贯通城乡网络、以收入分配改革抬升基础消费层级、以消费引导政策匹配供给韧性, 从而实现消费结构转型与增长动力切换的协同演进。

关 键 词 : 数字时代; 消费结构变迁; 宏观经济增长

Exploration of the Impact Path of Changes i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the Digital Age on Macroeconomic Growth

Deng Youra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the digital age have a systematic impact on macro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ransmission paths such as optimizing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scale, and reshaping capital formation efficiency. The digital upgrade of consumption drives the flexible response of industries, and new business forms enhance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However, consumption stratification and intertemporal allocation also lead to growth constraints such as regional imbalance, capacity misalloc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tickiness. The optimization path lies in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networks through digital infrastructure, raising the basic consumption level through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 and matching supply resilience through consumption guidance policies, thereby achieving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driver switching.

Keywords : digital age; changes in consumption structure; macroeconomic growth

引言

在数字时代, 以移动支付、电商平台与大数据算法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正深刻重塑居民消费行为与偏好, 传统消费结构加速向线上化、服务化及个性化跃迁。这一结构性变迁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优化供需匹配效率及催生新业态, 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多极传导路径产生复杂影响。探究其影响路径, 不仅有助于厘清数字经济赋能内需扩张的微观机制, 亦能为政策制定者识别潜在增长瓶颈、防范结构性失衡提供理论依据, 对实现高质量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消费结构演进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历史逻辑

(一) 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的阶段特征

从恩格尔系数主导的生存型消费, 到以耐用品普及为标志的物质型消费, 再到服务与体验占比攀升的发展型消费, 居民消费结构的跃迁映射了工业化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收入层级突破与需求梯度升级。每一阶段均伴随主导产业更替: 食品农业、轻纺工

业、住宅汽车与文旅健康依次成为增长极。消费偏好从同质化排浪式转向差异化品质化, 推动生产体系由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深耕^[1]。这一历史轨迹表明, 消费结构演进并非被动依附于收入增长, 而是通过重塑最终需求结构, 倒逼供给体系动态调整, 进而牵引宏观经济实现阶段性跨越。

(二) 数字技术重塑消费层级的典型事实

数字技术对消费层级的重塑体现为三重跃迁: 其一, 时空边

界消解，即时即地的在线消费与无接触交付使高频小额交易成为常态，边际消费倾向显著抬升；其二，信息不对称缓解，算法推荐与用户评价体系降低了搜寻成本与信任壁垒，长尾市场与垂直品类获得流动性溢价；其三，消费场景融合，线上引流与线下体验的 O2O 模式催生了“逛购分离”“先试后买”等新型行为范式，服务消费与实物消费边界趋于模糊。典型事实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不仅加速了消费结构的服务化转向，更通过降低交易摩擦放大了收入增长对消费的弹性系数。

（三）增长动力由投资向消费切换的结构拐点

在工业化中后期，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与基础设施饱和度上升使投资驱动模式遭遇效率瓶颈，而居民收入占比提升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为消费主导增长创造了需求侧条件。结构拐点的识别可从三方面把握：投资率由升转降并稳定于合意区间、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超越资本形成总额、消费结构中的发展享受型支出占比越过 50% 阈值。数字时代的到来加速了这一拐点进程，平台经济释放的下沉市场购买力与零工经济拓展的灵活收入来源，共同推动增长极从厂房设备与房地产转向数字内容、在线服务与智慧生活场景。

二、数字时代消费结构变迁对增长路径的传导机制

（一）消费数字化升级驱动产业供需匹配优化

消费数字化升级通过数据要素嵌入需求识别、生产调度与流通配送全链条，重构了产业供需匹配的微观基础。在线交易平台沉淀的海量消费轨迹与偏好标签，经由机器学习算法转化为细颗粒度的需求预测信号，驱动供给端从批量预产转向按需柔性响应。智能排产系统与实时库存管理消解了传统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使生产计划与真实消费节奏趋于同步^[2]。与此同时，双边市场机制下的动态定价与精准推送降低了信息错配导致的库存沉淀与产能闲置。这一匹配效率的提升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产业结构加速向高周转、低库存、短链路方向演进，经济增长路径因此获得更为平滑的需求牵引力。

（二）新型消费业态扩展内需规模与边际效能

直播电商、社区团购、订阅制服务与虚拟商品交易等新型消费业态，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双重维度扩展了内需规模。在广延边际上，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下沉市场与银发群体，将传统支付能力与数字技能门槛下的非消费者转化为有效需求主体。在集约边际上，场景化种草、社交裂变与限时拼团等交互设计持续刺激非计划性购买，抬升了给定收入水平下的平均消费倾向。更为关键的是，数字订阅与会员经济通过锁定长期复购关系，平滑了消费的跨期波动，使总需求曲线趋于稳健。边际消费效用的衰减速率因个性化推荐与精准匹配而降低，单位收入增量所撬动的消费增量显著高于传统渠道，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由此获得系统性提升。

（三）消费分层与跨期配置影响资本形成效率

数字时代消费结构呈现显著的分层特征：高收入群体加速向体验型、符号型与虚拟型消费迁移，而中低收入群体的刚性支出

仍集中于生活必需品与平价替代品。这种分层投射到储蓄—投资转化环节，改变了资本形成的来源结构与配置效率。高收入群体的边际储蓄倾向较高，但其消费升级方向（如数字内容、知识付费）对应的资产轻量化特征，削弱了传统投资乘数效应；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占比高但储蓄转化率低，制约了资本积累规模^[3]。跨期配置层面，数字信贷与先买后付等工具鼓励当期消费，可能挤占储蓄向生产性投资的转化通道。若消费信贷过度膨胀，资本形成效率将面临消费对投资的跨期挤出风险，宏观调控需在激发短期需求与保障长期资本供给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三、消费结构转型中的增长约束与结构失衡

（一）数字消费扩张加剧区域增长非均衡性

数字消费的扩张虽在总量层面提振了内需，却在空间维度上放大了区域增长的非均衡特征。电商交易、在线娱乐与远程服务等数字消费场景高度依赖宽带网络、物流枢纽与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东部及城市群凭借先发优势吸附了绝大部分数字消费增量，而中西部与农村地区囿于数字基建滞后与供应链末端劣势，本地消费外流至平台总部所在地，形成“消费流出一税基萎缩—公共服务弱化—消费能力进一步受限”的循环累积效应^[4]。更关键的是，头部平台基于算法推荐的流量分配机制天然倾向于高密度消费市场，边缘区域的长尾需求难以获得规模化的供给响应。这种数字消费的地理集中性，使区域间增长差距从传统的生产端投资差异延伸至消费端的流量极化，宏观增长路径因而承载了更大的空间收敛压力。

（二）服务性消费快增与传统产能过剩并存

消费结构向服务性消费的快速倾斜，与制造业传统产能的去化滞后形成尖锐对立。文旅、康养、在线教育及数字文娱等服务消费的支出弹性显著高于实物商品，其高速增长从需求侧引导资本与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然而，供给侧存在明显的调整粘性：重化工业、低端纺织与通用设备制造等领域的大规模沉淀资本与专用性资产难以快速转产或退出，在总需求结构已然转向服务驱动的情境下，传统制造业面临产能利用率下滑与价格持续承压的双重困境。更为深层的问题是，服务消费扩张对工业品的引致需求弹性较低，无法有效消化过剩产能。这种产业供需的结构性错配，表现为 GDP 增长与工业增加值、PPI 走势的背离，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由此遭受来自传统部门产能出清压力的持续侵蚀。

（三）收入分配黏性制约消费层级正向跃迁

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从物质型向服务型的正向跃迁，本质上以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与分配格局的边际改善为前提。然而，收入分配结构在制度性与市场性因素作用下呈现显著黏性：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长期处于低位徘徊，资本所得与要素垄断收益的集中倾向抑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张速度。更为关键的是，数字平台经济中“头部通吃”的赢家分配机制与传统行业低技能岗位的替代效应叠加，使收入差距呈现极化趋势^[5]。中低收入群体即便在总量收入增长中有所获益，其边际消费支出仍高度集中于必需品层级，难以跨越服务消费与品质消费的进入门

槛。这种分配黏性使得消费结构升级的宏观效应被显著稀释，增长动力由投资向消费切换的预期拐点因需求侧的结构性疲软而一再延宕。

四、优化消费结构以稳定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

（一）以数字基建贯通城乡消费网络节点

当前城乡消费差距不仅源于收入水平的绝对差异，更在于数字接入能力与物流响应效率的不对等——农村地区的宽带覆盖率、冷链物流末端以及本地化电商服务站点仍存在明显短板，导致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数字基建的贯通策略应从硬件与制度两个层面协同推进：硬件层面，加快县域商业体系数字化改造，构建“县级共配中心—乡镇中转节点—村级服务站点”三级物流网络，降低农村地区末端配送成本；制度层面，推动平台企业开放订单聚合与流量分发能力，建立区域性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的双向对流机制。更为深层的是，数字基建应超越传统“路网思维”，通过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消费大数据平台，使偏远地区的消费偏好能够被精准识别并纳入供给响应体系，从而在需求侧消除地理边缘感，在供给侧释放长尾市场活力。只有当城乡消费网络从“单中心辐射”转向“多节点互联”，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增长红利才能真正实现空间上的普惠配置。

（二）以收入分配改革抬升基础消费层级

消费层级的正向跃迁本质上受制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与相对分布，收入分配结构的刚性黏性若不破除，则消费升级将始终停留于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改善而无法形成全局性动力。抬升基础消费层级的核心路径在于双重调节：初次分配环节，应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通过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以及灵活就业者社保覆盖扩围，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持久收入预期；再分配环节，需优化税制结构与转移支付效率，探索对平台经济高收入群体的超额收益实施累进性调节，并将增量财力定向投向基础教育、公共医疗与保障性住房，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以释放消费潜力。值得强调的是，数字时代的收入分配改革面临新挑战：零工经济模糊了雇佣关系边界，算法驱动的计酬模式可能压低单位劳动报酬。政策应对需建立与数字就业形态相匹配的收入监测体系，推行按次结算与最低时薪保障并行的治理框架。只有当基础消费层级被系统性抬升，占人口主体

的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跨越服务消费与品质消费的进入门槛，消费结构转型方能摆脱“上层升级、底层承压”的失衡困局，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压舱石。

（三）以消费引导政策匹配供给体系韧性

消费结构的持续演进对供给体系提出了动态适配要求，若供给侧调整滞后于需求侧变迁，则结构性摩擦将转化为增长阻力。消费引导政策的职能应从传统的需求刺激转向供需匹配效率的系统优化，其核心在于构建具有前瞻性与灵活性的供给韧性体系。具体路径包括：建立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消费趋势预警机制，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高弹性领域进行需求规模预测与品类结构分析，引导制造业资本存量向高速增长赛道柔性转产；完善产能退出与资产重置的法律框架，对传统低效产能实施市场化出清，同时设立产业调整援助基金，用于专用性资产的改造升级与劳动力跨行业再配置。更为关键的是，消费引导政策应主动塑造供给侧的响应能力边界，而非被动适应需求波动——通过质量标准升级、能效标识管理等制度工具，将消费偏好向高品质、低碳化方向牵引，同时依托“链主”企业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模块化生产体系，使生产线能够在不同品类间快速切换。此外，服务消费领域的供给瓶颈尤为突出，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的准入限制与标准化滞后严重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政策应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在线诊疗、远程教育与智慧养老等新业态，以制度创新降低服务供给的边际成本。唯有当供给体系具备足够的韧性以承载消费结构的动态变迁，增长路径才能在消费引擎的持续驱动下实现稳中有进。

五、结论

研究表明，数字时代居民消费结构变迁通过供需匹配优化、内需规模扩展与资本形成效率重塑三条路径驱动宏观经济增长，但这一进程伴生区域非均衡、产能错配及收入分配黏性等结构性约束。消费数字化升级的积极效应与转型中的失衡风险相互交织，使增长动力由投资向消费的切换并非线性顺畅，而需依赖数字基建贯通、收入分配改革与供给韧性提升等系统性政策干预。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拟现实消费等新兴业态对消费层级的再分化效应，以及数字货币与跨境数据流动对消费结构空间格局的深远重塑。

参考文献

- [1] 潘癸邑, 陈闻君. 数字经济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再审视: 数字产业化视角 [J]. 上海商学院学报, 2026, 27(01): 72-93.
- [2] 孙佳薇, 王鹏飞. 数字经济驱动下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与升级研究 [J]. 上海商业, 2025, (12): 84-86.
- [3] 李新英, 白润雪. 银发经济赋能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居民消费的调节效应 [J]. 当代经济, 2026, 43(02): 40-48.
- [4] 朱冬元. 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服务化转型的动态影响 [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 (09): 34-37.
- [5] 刘焱. 关于宏观经济指标对卷烟消费结构提升影响因素分析 [J]. 老字号品牌营销, 2021, (04): 35-36.